

大医之路:用一生回答一个问题

如今郑树老了,但她的心态依然年轻,她一手创立的随访系统也在不断更新

她还当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,她相貌端庄,还参与过电影《女篮五号》试镜。

本报记者 黄小星文/摄
通讯员 方序 鲁青

8月24日,钱江晚报记者见到郑树的时候,她正“咔咔”地点着鼠标,准备月底去北京讲课的大会报告的幻灯片,她的身后,是金庸先生写给她的一幅字,“郑人高义,树木树人”。

“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,几十年下来已经习惯了。”郑树常年穿着平底鞋,她带领钱报记者下楼去见她两位年轻的研究生,记者差一点跟不上她的脚步。

其实,早在2002年,郑树71岁时,就正式退休了。那一天,没有鲜花、没有仪式,甚至和前一天没有任何不同,就像永远纤尘不染的白大褂。

郑树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作岗位,“医院仍旧保持我的工作环境,我也有力气继续干下去。”她笑笑说。

如今,每周一、三上午,是郑树固定出门诊的日子,下午,还要诊治上午留下来的病人;每周二是MDT(多学科诊疗模式),其他时间还要上课、带研究生、做课题。



郑树教授在工作中。

20年随访,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31%

郑树终其一生都在和大肠癌之谜作斗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,她率领团队到海宁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。

当时,海宁有56万人,她们查了30岁以上的24万多人,靠的就是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。

第一年,团队筛出4000多例高危人群,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,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,荣誉纷至沓来。

回到杭州,夜阑人静,郑树却想起下乡时居住在破庙的夜晚:方圆几里没有人烟,有时早晨醒来,白茫茫一片,低头看,棉被上也飘落了雪花。她陡然打了一个激灵,继而想起那4000多个高危人群,心底一个声音问:“难道我们把他们筛查出来,就不管了吗?”

年少时,郑树做小学校长的父亲教育她,就是朴素的一句,“做人一定要负责任”。

在郑树的牵头下,海宁和嘉善的筛查,从此一年年地做下去了,随访也伴随始终。嘉善县自1987年起开展肿瘤登记报告工作,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登记工作的登记点之一,由于资料保存完备、质量高,肿瘤登记数据连续4次被《五大洲癌症发病率》收录,是国内县级肿瘤登记处唯一一个。而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,团队进行了每2~3年随访复查长达20年,经统计明确,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了31%。

一张张随访卡,积累出独到的临床经验

如今,仍带领研究生做课题的郑树,还有两个最想解开的谜底。一个,她想探究,为何有的肿瘤局部很小,但很凶险;还有一个,是肠癌为什么会转移到肝脏去,“要预测,要干预,要阻断,”郑树干脆地说。

“肿瘤的合理、科学、规范化治疗,要建立在很好的随访基础上,郑校长就是想建立这么一套体系,”在郑树的弟子、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看来,随访卡以小见大,体现的是“一个普通医生、一个负责的医生和一个负责的医生科学家”的差别:“一个普通的医生,毛病治好了,我就不管了;一个负责的医生,认认真真治,治好了病人感谢你;但郑校长是负责的医生科学家,她强调规范化治疗,但是在此基础上,又特别强调个体化治疗。我们总是讲医生的临床经验,有时临床经验就是一种感觉,郑校长的感觉,就是从一张张随访卡片里积累起来的。”

郑树听着,摇摇头,笑了,指着丁克峰说:“你讲得太过头了,”她又指指丁克峰,“当我研究不动时,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。”

30多年前的问题,郑树用了一生来回答

1984年,当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,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、乳腺癌专家、提出辅助治疗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(伯纳德·费舍尔)面前,首先让53岁的她震撼的,是Fisher先生建立的一套完整而庞大的随访体系:“当时,每年就有2000个乳腺癌病人的治疗材料要进入Fisher先生的随访体系,制度非常完整。”

当第一次在Fisher办公室见面,Fisher上下打量这位中国客人,很干脆地问她为何要来这里。郑树被突如其来的提问打蒙了,她脱口而出两个病例,一个是一位武汉病人,开刀18年后,“冬眠”的癌细胞苏醒;还有一个是郑树的好朋友,她的乳腺肿瘤很小,郑树为她实行了扩大乳房根治术,结果还没出院发现右下腹转移结节,一个礼拜后骨转移,一个多月就离世了,“这么小的肿瘤为何如此凶险,我想不通”,她告诉Fisher。

为何要来这里?这个问题,郑树几乎用了一生来回答。而她的个人命运,也无可避免地随时代沉浮。

郑树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,经历过动荡岁月,参与撰写中国最早的一套肿瘤学专著,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,桃李满天下。她一点点“讨钱”建起西湖边的浙江医科大学3号教学楼。她访学过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英国、瑞士,甚至还当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,她相貌端庄,还参与过电影《女篮五号》试镜。

心态年轻,永远对新技术充满好奇

像一棵树历经风雨后将年轮刻在内心,如今郑树也老了。71岁时,曾经的“一把刀”、能把手术剪刀当血管钳使的她还在上手术。她记得,最后一台手术,是一个上海来的盆腔肿瘤病人,当地的医院说无法手术,郑树看了片子,觉得盆腔间还有空隙,能做!

下了手术,郑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镜,其实,她上手术台时根本没戴。“原来我还能看清啊!”郑树自豪地想。

而她一手创立管理的随访体系,还在不断更新。张惠娟老师自2016年开始接过随访任务,平均每天要打30个以上的电话。像楼上的郑树教授一样,她也喜欢听到好消息,病人在电话那端一句“都蛮好的”,就能让她喜笑颜开、频频点头。也有时电话那头,也许是个年轻人的声音:“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问!”张惠娟叹息一声,并不把自己受到的冷遇放在心上。一个电话打不通,她做好记号,隔天再打。随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而她做的就是最平凡也是最基础的工作。

除了“笨功夫”,随访还步入大数据精准医疗的新时代。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,带领团队领衔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——“结直肠癌专病队列”。目前,队列研究中的随访,将大数据技术、流行病学理论和遗传学技术等高新技术汇集,成为了精准医学时代的先锋学科。这些技术的整合,将使随访的信息更加准确,分析更加客观,得出的结论,将使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更加精准有效。

“在校长的眼里,我们永远都是孩子,其实校长的心态也还和孩子一样,永远对新技术、新事物充满好奇,充满求知欲。”丁克峰说,郑树校长依然是他们的“定海神针”,郑树言传身教的医术、医德、医道,足以令他终身受用。

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的那天,郑树缓慢地脱下白大褂。一回头,她恍惚看见第一次上手术的自己。那一年,她23岁,还是个实习医生。那是一台阑尾手术,她负责缝伤口。拆线的时候,她发现伤口不平,稍微有点高低。这个疙瘩,仍存在87岁的郑树的记忆里。